

北京女杰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编

北京出版社



北京女杰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编

北京出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北京女杰》的第一集。它介绍了曾经战斗在北京的十四位革命女英烈的光辉事迹。她们中有随着时代前进，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及其革命活动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革命老前辈；有妇女运动的先驱；有为妇女解放奋笔疾书的女作家；有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不畏艰险英勇机智地进行战斗的地下工作者；有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保存经费、赠送医药的“金库主任”；有战斗在山区为民族解放捐躯的妇联主任。她们不愧为革命的英杰，妇女的典范。她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是妇女们学习的榜样。此书文字流畅，事迹生动感人，是对妇女和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优秀读物。

北 京 女 杰

Beijing Nūjie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6.5印张137,000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071·233 定价: 0.89元

女杰的光輝業績和偉大的
革命精神，鼓舞着北京婦女
奮力獻身四個現代化的壯麗
事業，做改革的弄潮兒，建設
首都，振興中華。

范瑾

前 言

北京,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它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在这里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从这里开始。六十多年来,她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哺育了无数的优秀儿女。

在阴霾沉沉、长夜漫漫的旧中国,妇女除受帝国主义压迫外,还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极大绳索的束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勇敢地冲破封建罗网,与男子们一道肩负起改造社会、争取民族解放和妇女自身解放的历史重任,显示出妇女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

本书介绍的是十四位曾在北京战斗过的杰出妇女人物。其中有从辛亥年间反清斗争就开始踏上革命征途的老前辈;有五四运动的女闯将和新文化运动中为妇女解放奋笔疾书的女作家;有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有在与封建军阀斗争中惨遭杀害,殒身不恤的女烈士;有在白色恐怖下机智勇敢地进行战斗的女地下工作者;还有与我党密切合作做出成绩的爱国妇女。她们脚踏实地、不屈不挠,在人民革命和妇女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们的光辉业绩不仅为中国革命历史增添了壮丽的一页,也为北京妇女运动史

树起了不朽的丰碑。现将她们的生平事迹编印成册（以后将陆续编印），以告慰英灵，并借此激励首都广大妇女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当改革的实干家，做振兴中华的先锋！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

目 录

北京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1)
-------------------	-------

——廖伯英同志

疾风知劲草

——记郭隆真烈士	(14)
----------------	--------

干练坚决 铁骨铮铮

——记刘和珍烈士	(38)
----------------	--------

殒身不恤 英气长存

——记杨德群烈士	(53)
----------------	--------

“三·一八”女旗手魏士毅	(67)
--------------------	--------

绞刑架下的勇士

——记张挹兰烈士	(77)
----------------	--------

火把燎燃 呼声警深

——女作家石评梅传略	(98)
------------------	--------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张秀岩大姐	(119)
-------------------------	---------

浩然正气 风范长存

——记张晓梅同志	(135)
----------------	---------

“妈妈同志”

——任锐	(151)
------------	---------

从将军夫人到八路老大姐

——记廉维同志	(161)
---------------	---------

百花山下留英名

——记李云烈士 (181)

海圪女儿

——记贾桂珍烈士 (189)

“金库主任”

——记李铮同志革命事迹 (194)

北京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缪伯英同志



在北京妇女的革命历史上，有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她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同志。

缪伯英同志，一八九九年十月诞生在湖南长沙县。她的家清泰乡枫树湾坐落在城东北一百多里，这里群山环抱，山清水秀。缪伯英的父亲缪云可先生，晚清中过秀才，曾去日本考察，受日本维新思想影响，思想较为开明，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缪伯英的母亲汤尚桓是一个初具文化，深明大义，诚恳朴实的家庭妇女，深受亲友邻里称道。缪伯英兄弟姐妹共三人，她排行老大，乳名玉桃。

缪伯英出生在清王朝内外交困、日趋败亡的年代。当时大好的中国河山，屡遭列强侵略，被《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广州湾租界条约》、《胶澳租界条约》、《旅大租地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订租威海卫专条》、

《福州口日本专用租界条款》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瓜分、蚕食。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缪云可先生，为国家民族的存亡，常常夜不成寐。但在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下，爱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讲话权利的。缪云可老先生的满怀悲愤和忧愁，只能向妻子儿女诉说；一腔为国为民的热血，只能倾注在对儿女的谆谆教诲中。伯英虽然是个女儿，但具有改革思想的缪云可先生也象教男孩子一样教她。当缪伯英还在孩提时代时，就开始对她讲述文天祥、秋瑾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向她吟咏岳飞的《满江红》等气壮山河的辞章。每当这时，缪伯英总是屏气凝息，百听不厌。这些民族英雄们慷慨悲壮的故事和燃烧着火一般激情的爱国诗篇深深地打动着她，陶冶着她的爱国主义的情操。被父亲视为座右铭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小便镌刻在她的心田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加深。她崇拜屈原、岳飞、文天祥、秋瑾……，羡慕女中豪杰花木兰。她向往着有那么一天，她能够象这些民族英雄们一样为国出征，血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在学校里，她勤奋好学，刻苦努力，成绩总是全班最优秀的。在家里她象男孩子一样，经常挑水、扫地、干各种杂活，常常被弟弟妹妹们亲切地称为“桃哥”。据缪伯英的老同学回忆：“这个身材适中，衣着朴素的女同学，有着一股奋发向上的精神和一种勇敢刚毅的性格。她不仅学习好，而且有理想，有抱负，有主见，思想激进。在她身上有一种与当时女性懦弱、顺从的性格很不相同的气质。”

一九一六年缪伯英十七岁。她在父亲的支持下，冲破封建社会对女子的重重束缚，从家乡步行百里，来到有浓厚改

革风气的省会长沙，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这时，反对封建专制、主张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兴起。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消息传到长沙，正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中成长着的缪伯英极为振奋。她渴望加入“五四”革命运动的行列。渴望到北京领悟更多的革命道理。

这一年，缪伯英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秋天，这位年轻的姑娘怀着十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一身素衣，几件轻装，风尘仆仆地从千里之外赶到向往已久的“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

“五四”运动后的北京，弥漫着浓厚的革命气氛。青年们热烈地追求新潮流，学生组织十分活跃。缪伯英一到北京，便投入到这股革命的热潮之中。她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湖南学生同乡会，并通过这个小团体，广泛结识了一批探求真理、立志改革的革命青年，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邓中夏、黄日葵、何孟雄、高尚德、范鸿勳、朱务善、罗章龙等。他们一起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各种进步书刊。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战斗檄文深深地吸引着她。特别是李大钊的《青春》一文，更加强烈地激励着缪伯英的革命进取心。在黑暗深沉、前途茫茫的社会里，她被李大钊的那种气势磅礴，要创造青春的国家、青春的民族、青春的人类、青春的地球、青春的宇宙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所鼓舞，为李大钊的渊博学识所折服。

一九一九年底，缪伯英得知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

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后，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社会的向往，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社会”的理想，加入了这个团体，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因为参加社会活动，她在女高师的学习延长了一年，直到一九二四年秋季才毕业）。她与致殊、冰如、张人瑞、田维以及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浩等十几个女同学共同组成了该团的第三组，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租了东安门北河沿十七号为小组活动的地点。和她同时考取北京女高师的同乡女友，对缪伯英这样热心社会活动一直感到不可理解，对她参加工读互助团更是觉得奇怪，“到北京是来专心读书的，怎么能跑去做工呢？”这位女友曾去找缪伯英，劝她回校继续“正规”的学习，毕业后好回家乡做事，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缪伯英谢绝了同学的好意，坚定地走自己选定的追求理想、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道路。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缪伯英等在北京《晨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吾亲爱的姐妹们曷兴乎来！》的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的宣言和《第三组工读互助团简章》。在宣言中她们对“具有毅力”、“处黑暗家庭、受种种束缚”的姐妹们呼吁，号召她们参加“本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造就社会的新生活”的女子工读互助团。最后，她们向处于沉沉黑夜中的中国妇女热情召唤：“千万不要错过！快快来罢！欢迎！欢迎！”

缪伯英等人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尽管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她们追求平等、自由和进步的举动，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很大震动。北京有个议员的女儿，还在中学读书，当看

到报上刊登女子工读互助团的消息后，就去找缪伯英，激动地说：“我很喜欢你们这个组织，我愿意加入，你们招收我吧！招收我吧！”缪伯英被这个女学生真诚、热烈的愿望深深打动了，她深情地望着她说：“你同意我们的主张，你就来吧！”这个女孩子看到自己的要求被答应了，高兴万分，坚定地向缪伯英表示她不回家去了，一回去家里就不叫她来了。以后这个女孩子就跟缪伯英一起，一边学习，一边劳动，过得十分愉快。她家里一再派人找她，她说，“我愿意过这种生活，这比家里好多了。”

由于缪伯英和姐妹们的积极努力，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存在的时间较第一、第二、第四三个组都长。在第一、第二组一九二〇年三月停办以后，它们还继续坚持了好几个月。直到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六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还刊登有关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招揽缝纫的广告。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坚持到最后的成员有缪伯英、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浩（朝鲜人）等四人。一九二〇年九月五日出版的《妇女杂志》第六卷九号以“女子工读互助团”为题，刊登了她们四姐妹的照片。缪伯英她们精心创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影响较大，得到一些青年人的支持。但是，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终因无法维持下去而告结束。

从一九二〇年开始，缪伯英来到北京大学旁听。一次，她旁听了李大钊的课。李大钊带着浓重的河北乡音，向青年们讲学习目的，讲国家、民族的存亡，讲青年的生活方向。他说：“……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单是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是不行的。现在的社会，是黑暗的社会，是个遍体鳞伤的社会，到处充满了痛苦、悲惨、眼泪……”，

“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产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他热情地呼吁“青年呀，只要我们敢于奋斗，敢于拿光明去照彻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努力呵，猛进呵，我亲爱的青年。”^①李大钊热情的话语，强烈地撞击着缪伯英那颗年轻的心。她感到周身象燃起了一团火。到这时，她好象才真正开始懂得了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做人，年轻人身上担负着怎样大的责任。下课后，缪伯英找到李大钊，十分激动地说：“您讲的真好，我不是本校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答应了她的要求。从此以后，缪伯英经常到李大钊处请教，成为李大钊同志一名得意的女学生。

缪伯英曾经崇拜过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她开始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一九二〇年初，缪伯英又在李大钊的建议下，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研究会里，她认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的“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仔细阅读《新青年》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为她后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先驱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缪伯英对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十分向往，虽然她没能到苏联去，但她冒着危险，热情地为赴苏同志把秘密文

^①是1979年作者访问罗章龙时，罗章龙的一段回忆。

件缝入棉衣内。

一九二〇年下半年，由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大一院召开一次“学术谈话会”。会上，李大钊讲演了《自然与人生》，邓中夏提出讨论“罗素·勃拉克与中国婚姻问题”。缪伯英应邀出席，并参加了讨论。不久，她正式加入该会，成为这个在“五四”时期有广泛影响的社团中的一员。

在李大钊的直接教导下，缪伯英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逐渐成为一个坚毅、沉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她不仅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孜孜以求，还经常向周围的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把马列主义的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的手中。据当时常和她在一起学习、活动的同志说，当时正在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同志，也曾经崇拜过无政府主义，并且说过：“我不能放弃我的主义”。但在缪伯英的耐心说服下，何孟雄不但从思想上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而且成为我们党早期的职工运动领导者、优秀的共产党员。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缪伯英与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等一起在北京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个女团员，也是中国最早的几个女团员之一。也是在这一月，她参加了由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我党早期组织的一名成员。

缪伯英从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以后，便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身份，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她写成了《家庭与女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详细地

分析了家庭问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它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她写道：“家庭组织是人类进化中一（定）时期的制度”，“是人类所创的一种制度”，“大凡一切制度，都是人类对于那时期所需要的一种产物；所以那产物之于人类，不过是适于那时期的环境。环境是随人类进化而时时变迁的，所以制度也没有千古不变的道理。况且人类既具有创造制度的能力，当然就有改革变除的可能，断没有至高灵气的人类，仅做出那自苦自陷一成不变的束缚来。”“大凡人类对于一种制度发生不满足的问题时，由怀疑而至于破坏，由破坏而至于改造，纯是人类进化很平常而不可免除的一种现象。故无论是一种怎样轰烈的维新运动，改革风潮，实丝毫没有什么稀奇，更丝毫没有什么可怕和反抗的价值！”因此，她提出：应“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她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家庭制度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历史现象，是由人类创造出来，也可以由人类加以“改革变除”的。这对变革旧社会，破除当时中国封建家族制度都有进步意义，对当时妇女打破家庭牢笼，参加社会革命，也有解放思想的作用。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缪伯英由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从此她更加朝气蓬勃地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缪伯英同志任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根据党的指示，她经常到丰台、南口、唐山、石家庄等地，深入工人群

众和家属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一年，陇海路工人罢工的时候，我党决定派人前去支援。因为经费困难，筹不起盘缠。缪伯英不顾当时天气寒冷，卖掉了自己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和其他同志一起凑钱给支援罢工的同志作旅费，还主动帮助他们做衣服，使支援罢工的同志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同年，缪伯英与在工作中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何孟雄同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结成为伴侣。婚后，她们夫妻俩人和其他同志一道，为解放被压迫的中国劳苦大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五月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工人周刊》就成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这时缪伯英一身兼二任，既担任《工人周刊》的编辑，同时又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通讯处》的编辑。她曾用笔名“伯英”、“英”等与何孟雄共同编写了大量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及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文章，深受工人同志们的欢迎。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号召“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工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北方地区的党组织为贯彻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决定于八月在北京组织联合战线性质的公开团体，定名为“民权运动大同盟”，“凡有志争民权者皆可加入”。由缪伯英和蔡和森、高尚德、范鸿劼、郭春涛、刘仁静等十余人出面发起，八月二十日，在筹备大会上，缪伯英与蔡和